

东南亚华人的政治社会化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对比分析

王 虎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东南亚; 华人; 政治社会化

[摘 要] 华族为东南亚各国民族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 由于东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 华人社会本身也存在差异, 不同国家的华人、华人中不同的群体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和方式是不同的。本文试运用派伊“社会化三阶段”理论对马来西亚和泰国华人的政治社会化进行对比分析, 管窥东南亚华人政治认同和融入当地社会的不同进程和不同道路。

[中图分类号] D634.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07)02-0029-07

一、背景和理论简介

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的关系, 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构成了中国海外移民史一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外移民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000 多年的唐朝。16 世纪初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 移居东南亚的中国人逐渐增加, 到 19 世纪前期, 东南亚国家的港口城市里已形成了中国移民的居住区, 华侨社会已初具规模。1840 年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剥削下, 中国沿海和边境地区的劳动人民大量涌出到国外谋生^[1]。据初步统计,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百年中, 中国海外移民总数至少达到 2000 万人以上^[2]。中国移民在海外的分布, 以东南亚地区最多、最为集中。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部分地区)是中国移民的中心集散地, 1881~1939 年到达这里的中国移民约 830 万人, 其中契约华工占了 600 万^[3]。大多数中国移民从这里被转送到南洋其它各地。据不完全统计, 当时马来半岛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有 915883 人(包括新加坡华侨 222655 人)^[4], 暹罗有 270 万人^[5]。总之, 鸦片战争后移居东南亚的中国人不仅人数众多, 规模巨大, 而且分布范围广大。

经过数世纪的不断移民和定居, 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逐渐演变为一复杂结合体。部分华人已定居东南亚

[收稿日期] 2007-03-31

[作者简介] 王虎(1963-), 男, 湖北南漳人,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讲师、博士, 研究方向: 华侨华人社会、东南亚政治。

达数世纪,且部分已与当地土著妇女通婚。土生华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称为 Babas 或 Strait-born Chinese,在泰国称为 Lukjin。数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化、土著文化与传统中华文化的交互冲击和结合下,他们成为一个文化结合体。在政治意识表现上,他们对中国国内政治较淡漠,对当地政治较关注。另一部分华人则为近数十年自中国移植来的新移民及其后裔,他们仍保有传统的中华文化,并不甚认同于居住国的社会。在政治意识上,他们仍关注祖籍国的政治,对当地政治却不甚关心^[6]。

华人社会中不同群体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意识,王庚武教授将具有不同政治意识的华人分为三大群体:第一个群体的华侨直接或间接与中国本土的政治发展相联系,关心祖籍国的政治发展;第二群体采取较现实的政治态度;第三群体为土生华人,他们则不关心中国本土的政治,而参与当地或殖民政府的政治活动^[7]。虽然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与政治意识并非完全一致,但以三群体去探讨东南亚华人仍不失为方法之一。本文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探讨也以此为基础。

如要论述华侨华人的社会化和政治社会化过程,仅仅以这“三个群体理论”为基础似还不够,因为社会化和再社会化是贯穿一个人一生的过程,出生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工作环境的变化、政党和政治系统、政治环境的变迁等无不在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政治人的过程中产生影响。美国政治学家、中国和东南亚问题专家卢西恩·W.派伊也认为人的社会化是一个过程,他把社会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基本的社会化阶段,指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二是政治社会化,指个人自觉地了解 and 认识政治世界,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认知;三是进入政治系统的政治录用过程,指个人从消极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他还认为,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这三个阶段是前后连接、相互增强的。但是在一个过渡性社会里,这三个阶段会呈现前后不一致的现象^[8]。所以有必要在“三个群体”的基础上对华人进行代际划分,即第一代华人大都出生在中国,他们是构成第一和第二群体华人的基础;第二和第三代华人大都出生在本地,他们是构成第三群体的基础。第二和第三代华人的区别是:第二代华人参与第一和第二群体的人数要比第三代华人多,第三代华人更多地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一般只对殖民政府或当地政府效忠,对中国政治淡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三个群体”理论和华人代际划分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特例并不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

二、战前泰国和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社会化

在泰国和当时的星马华人社会中,这三个群体都同时存在。最老的一代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然后才移民到泰国或星马的,他们是构成第一和第二群体华人的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代华人。其基本的社会化阶段是在中国完成的,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影响。虽然他们多半为文盲,为谋求生存而离开祖国,带来的只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宗教观念,缺少政治意识,但第一群体的华人也初步表现其政治态度与活动,通过参加社会性组织,如私会党组织,隐约地表现出反清与反传统的情结,然以生为中国人而自豪^[9]。他们虽有较强的华人意识,但是他们仍处于从基本的社会化阶段向政治社会化过度的阶段。他们在祖籍国的家庭和学校所接受的社会化还只是属于初级团体这个层次。第二群体的华人,孜孜追求名位与财富,其中不少向清政府购买官衔,用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星马,第二群体的华人除活跃于华人社会性组织、对中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外,还由于其经济、政治利益关系不得不与殖民地政府挂钩;在泰国,第二群体的华人除活跃于华人社会性组织、对中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外,也由于其经济、政治利益关系不得不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因此这个群体同时表现出多方面的政治态度和活动。不过到此时为止,东南亚的华人才完成派伊所称“社会化三阶段”的前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主要是由家庭、学校、劳动场所和私会党组织等政治社会化的实施机构完成的。除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等社会性组织外,政党和政治系统本身同样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某些重大社会事件和经历,如革命、战争、经济萧条等会对全社会成员留下影响痕迹。19世纪末与20世纪前40年间,东南亚华人完成了社会化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即华人从政治认知开始进入政治系统的政治录用过程,华人从消极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

参与者。这个阶段是由政党、政治系统等实施机构以及革命、战争等重大事件,借助华侨社团组织,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而完成的。

到 19 世纪末时,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仍是帮派色彩极浓的社团组织。华族的社团大都基于地缘、血缘和业缘的关系而建立。早期的华族移民来到东南亚,人地生疏,极易使来自同一乡、县、府和讲同一种方言的移民聚集在一起。众多名目的社团发挥着互助互惠、同甘共苦的功能。随着移民地域观念的不断扩大,地缘性的社会性组织从乡、县、府扩大到省,其结果是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和广西会馆等社团相继出现。

华族血缘性社团(通常称为“公会”、“总会”、“社”及“宗祠”等)以共同姓氏或同一宗族为基础,主要是为了联络宗亲感情,解决纠纷,祭祖,协助同宗解除贫困、疾病以及失业等困难。

华族业缘性组织主要是基于联络同业间的感情,协调同行间的争执,谋求行业的发展等目的而建立起来。华族业缘性组织虽然有超越地缘关系的趋势,但鉴于华侨社会通常有某一方言群体垄断某一行业的现象,所以其地方色彩很明显。

这些基于地缘、血缘和业缘而存在的华侨社团对华侨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多元功能。首先,后来华人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正是在宗教、家乡意识上发展起来的^[10];其次,它作为一种社会性组织执行了华人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功能,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使华人经历了深刻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当然,这种功能的发挥是和其它因素结合在一起的。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前 40 多年间,由于内外因素的刺激,东南亚华人的政治意识越来越浓郁和多元化。华人的政治社会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所谓内在因素,即西方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刺激华侨对祖国产生政治兴趣,他们渴望祖国强大,在当地派驻领事,或通过外交途径保护侨民的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19 世纪末,晚清政府对华侨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清廷除竭力设立领事馆外,更派遣文武官员抚慰海外侨胞,企图争取华侨对其效忠^[11]。与此同时,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 10 年,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东南亚各地开展活动,争取东南亚华侨社会的支援。这三股政治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刺激华侨政治意识的外在因素。无论是清政府,还是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在东南亚积极创办学校,保皇党和革命党还创办中文报章和设立书报社作为他们政治论战的主阵地。这些都对华侨的政治社会化产生了重要作用。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使自然人变成政治人的过程。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中说:“政治社会化”也就是一代人把政治标准和信仰传给下一代,这个过程叫文化传递^[12]。政治社会化了的人,总是赞成或反对某一种政治制度。以上三股政治力量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信仰:清廷极力维持其封建政治系统和统治,争取华侨对其效忠;保皇党极力推崇其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革命党则要彻底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和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政治标准和信仰灌输给东南亚的华侨以争取同情和支持,这种特定背景下的“文化传递”不仅构成对东南亚华侨政治思想的启蒙教育,而且促使众多的华侨积极参与其所信仰的政治同盟的政治活动。“华侨为革命之母”是孙中山先生对广大积极投身那场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并为革命成功做出巨大贡献的华侨的高度赞扬。国民政府成立后,其对东南亚华侨的争取更是不遗余力。除在东南亚各地派驻领事外,更经常派遣政府代表到东南亚抚慰和视察,协助当地华侨成立国民党支部,指导发展中文教育。由于中国国籍法规定,凡是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不论其出生地在哪里,都视为中国国民。这无疑有助于华侨对中国依附情感的加深,进而关心祖国的政治命运。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许多政府代表前往东南亚,鼓励华侨展开“抗日救亡”运动,这也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华侨的政治联系,更加激发当地华侨对中国的效忠^[13]。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不断扩大,广大华侨,特别是第一群体的华侨的政治意识逐步演变为强烈的政治行动。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8 年的“济南惨案”、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和 1937 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不仅极大地唤醒了华侨的民族意识,而且激发了东南亚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抵制日货,捐款赈济,回国参战和服务。上至富商巨贾,下到小贩劳工,都参与了这项运动,充分表现了华侨的爱国思想和行动。这次关系祖国命运的“抗日救亡”运动使华侨突破了华侨传统的帮派主义,使华侨的政治意识和行动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1938 年 10 月 10 日,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组织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标志着东南亚华侨的团结进入了这个更高的境界。

第二群体的华侨人数最多。他们表面上不公开从事当地或中国的政治活动。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他们自发而有效地组成一个团体,在不损害其本身利益和地位的情况下,参与倾向中国的政治活动^[14]。

应该说,在二战前的星马和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第一群体和第二群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活动大体近似,第一代华人在政治倾向上也大体一致。但第三群体(华人第二和第三代)却表现出很大差异。

在星马,第三群体的人数较少,他们大多数出生在当地,其基本的社会化阶段是在当地完成的,星马海峡侨生大多接受英文教育,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和影响是西方式的,他们对政治世界的认识以及进入政治系统的政治录用过程,都和殖民地政府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其政治意识与活动大都倾向效忠大英帝国与海峡殖民政府,并以大英帝国子民而自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清廷、保皇与革命三股势力在东南亚的活动也赢得部分海峡侨生的同情。也有部分侨生和当地土著有直接联系而同情当地土著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这样星马的第三群体又分裂为这三个部分。

在泰国,华人第三群体(大都为二、三代华人所组成)完全在泰国环境下土生土长,绝大多数已经融入泰国社会。这样,到二战结束时,泰国和星马的华人(特别是第三群体华人)在融入当地社会的条件和程度上已经显示出很大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政治社会化条件的差异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星马,由于华侨长期独立生活在殖民政府和土著之间,只有少数海峡侨生为殖民政府所录用,当地土著受殖民政府的压制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党和政治系统供华侨所依附。中国国籍法使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国民,所以众多华侨在卷入一系列中国政治运动,经历了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洗礼之后,中国成为他们必然的政治效忠对象。

但在泰国,现存的条件和泰国当局创造的条件给华侨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第一、马古国王(拉玛四世)当政后所实施的以“随风倒”为基础的外交成为以后泰国领导人的楷模,也使泰国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被西方国家正式殖民化的国家。君主专制政体一直延续到1932年,1932年后君主立宪代替了君主专制政体。这样,华侨(尤其是第三群体华人)就有一个可以直接依附的政治系统,而且这个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祖籍国的政治系统差别不大(中国在1911年前也为君主专制政体)。第二、泰国和中国同是信奉佛教的国家,泰国华人很容易适应那里的宗教体系。佛教认为人生短暂,物质有限,所以活着就要轻松、乐观、随意,不走极端;要与人为善,多行善事。这使得佛教在泰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宗教而存在,确切地说,佛教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在泰国人个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佛教是奠定泰民族宽容、豁达、热情、谦和、善良的民族特性形成的重要因素。第三、泰人与华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相近性是两个民族较易融合的一个主要原因。泰国和中国为邻国,在种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多少互有影响,华人可以很快适应那里的环境。长期以来,泰人不仅与华人极易和睦相处,而且泰华间的通婚也极为普遍,作为两族长期通婚的结果,泰人与华人在血缘上已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第四、虽然第一代华人大多因经济原因来到泰国,很少过问政治,但当第二和第三代华人融入泰国后,参与泰国政治活动的不在少数,从而形成泰国华人很早就有参加泰国政治活动的传统。从素可泰王朝到拉玛五世时期,就有不少华人受泰王重用在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他们中有突出贡献者与泰人一样多被授予爵位,晋升官职,有些还被赐予泰姓、泰名和泰国公民身份,使之较早地融进了泰国上层政治社会。这一政策后来一直为泰国历代国王所仿效并推行,直到今天仍被承袭下来,没有多少改变。如《泰国古今史》载“缅甸陷大城都,大城王朝沦陷之后,有一位华裔叫郑信,在泰东起义,终至光复泰国河山,建都于腾吞武里,皇号称吞武里皇——郑昭。”泰皇郑昭的功绩,至今仍为泰国人民所称颂。又如1932年6月24日,以华裔泰人銮巴立(又名乃比里,华名叫陈佳乐,祖籍广东澄海)为首的人民党推翻了泰国的君主专制,并编制了永久宪法,把泰国从历代的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对泰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华人对政治活动的直接参与的传统为第二、三代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当地政治树立了一个楷模。同时也表明华人可以很好地融入泰国社会。第五、公民权的取得对华人政治社会化过程有重要影响。早在1913年,泰国当局便颁布实施了第一部国籍法。此项法律对后来的历届泰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后来泰国政府的华侨华人

政策因政局变动而发生变化,但对华侨入籍问题基本上都是遵循第一部国籍法所确定的血统主义与出生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从第二代起,泰国华人对参与当地政治生活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致:1、第三群体的第二、三代华人一般都加入了当地国籍,在政治上认同泰国,把泰国当作自己的祖国;2、他们都较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与当地泰国人打成一片,他们参与当地政治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困难;3、泰国法律对已经成为泰国公民的华人后裔参与政治没有设置什么障碍。

三、二战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社会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地纷纷独立。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迫使东南亚华侨不得不作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转向。然而,早期那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忽视了华侨在南洋社会的政治目标,也错过为此目标而进行华侨社会自身的整合活动及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调整,20-30年代以中国认同为全部内容的华侨民族主义的局限性^[15],在此时暴露无遗。

在马来亚,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化和殖民政府的垮台,当地政治系统还没有建立,众多华侨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中国内战期间,星马两地华侨因不同政治立场导致华族社会的分裂,双方透过各自主办的报章,互相攻击,甚至诉诸武力^[16]。50年代的前五年,在200多万的马来亚华人中,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广大的华人对当地政治仍消极冷漠。他们并不热衷于近期间所举行的一连串市政委员与立法议员的选举。然而自1955年,星马华人经过10年的迷茫之后,马来亚阔步迈向自治独立之时,华人才从政治的迷途中逐渐清醒过来,对当地的国家认同作了一定程度的转向^[17]。第一群体的华侨除少部分与中国和马共保持联系外,大部分华人已逐步转移其注意力于当地政治,如各地中华总商会积极参与当地政治活动^[18]。第一群体的华侨大都转化为第二群体,第二群体的华人于1949年组织马华公会。马华公会是一个种族性质的政党,标榜为华人争取利益,并表明其反共立场和主张,其成立的目的即在表明马华并不和马共同流,而愿效忠当地政府。虽然马华并没有获得所有第二群体华人的支持,但马华与巫统的政治联合使其在战后马来西亚的政坛上居于重要地位。第三群体的华人长久以来即与中国本土少有联系,在此时的环境下逐渐由亲殖民政府转移到同情当地民族主义运动、投入当地政治活动,他们认定其命运与新兴独立的政权息息相关,从而局部或彻底地认同与当地社会,自认为“马来西亚人”,顶多加上“华裔”的称呼。为争取其利益与地位,他们以本地公民的身份,参与本地的政治活动^[19]。当越来越多的华人争取公民权并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时,他们意识到自己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面对的是新的国家、政府和领袖,他们要享受他们应得的权利,他们有义务认同和效忠这个国家及其政府和领袖。至此,马来西亚华人及其后裔正经历接受新的政治社会化阶段。

在泰国,由于20世纪初期,中国移民特别是女性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使得本民族间的通婚逐渐代替了异族通婚,从而延缓了华人与当地自然同化的进程,这种情况引起了泰王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国辛亥革命的影响,华人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加剧了第一群体华人政治意识的膨胀,也影响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对当地政治认同的进程。华人中日趋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这一时期刚刚萌芽的泰国民族主义思潮发生碰撞,出于自身民族根本利益的考虑,拉玛六世以立法手段加强了对华人的同化。另外还对华人在文化上实行泰化政策。从而加强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进一步融合。二战结束后,第一群体华人分裂为左派和右派两股势力,他们明争暗斗,引起泰华社会的分裂。曼谷的中华总商会成为两股势力的争斗场所。左派势力后因当时泰国政府的积极反共而消沉^[20]。泰国华人融入当地社会是一个自然延续的过程,因为泰国为华人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华人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在华人整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仅仅构成一小插曲,并没有动摇其政治社会化的自然延续的进程。二战后,尤其是1955年以来,泰国政府对华人的同化政策主要遵循两个原则,即限制新移民和放宽入籍手续,致使大批华人加入泰籍。1973年泰国制定宪法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将华人的参政范围进一步放宽,决议规定,在泰国出生,父母均为华侨的华裔,可享有与泰人同等的政治权利,且同时拥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并不再受到教育程度和是否曾服

兵役的限制。1975年中泰建交后,泰国政府又一次将华人的入籍条件放宽,从而使第一代华人和更多的华人新移民拥有泰国公民身份,促进了华人与泰人的融合。从1951年到1983年,泰国选举法经过几次修改,最终确立了华人在泰国政坛上与泰人完全同等的政治地位。1951年的选举法规定,作为候选人的华裔,其父必须是泰人,至少也应是第三代华裔。到1957年大选时这一尺度放宽为在泰国出生的华裔,有选举权者即有被选举权。1983年大选时则规定,只要是合法的泰籍公民,均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如今95%以上的人籍华人已完全享有与泰人同等的政治权利^[21]。

泰国华人正是在泰国这个稳定的社会里顺利完成社会化的三个阶段并使这三个阶段前后连接、相互增强。在基本的社会化阶段,泰华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是泰国化的教育和影响,对政治态度的形成过程所做的调查说明,最重要的政治态度的形成时期是3~13岁。学龄期间,家庭仍起着主导性的影响,尽管发生在家庭中的政治社会化大多是非正式的,有时是无意识的,但这一切都在无意识地塑造儿童未来的政治行为。战后,泰国政府关闭了全部中文学校,华人子女与泰人子女一起上泰语学校,一起唱泰国国歌,一起面对泰国国旗,一起接受泰国文化和价值观教育。在1963~1964年间,美国学者Alan Edward Guskin曾对曼谷市六所泰语中学的1115名男女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包括华泰两个民族),了解泰国学校在华人青年学生社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Alan Edward Guskin得出结论说:“与其它形式相比,这些学校在同化华人青年方面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它们的管理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完成基本的社会化阶段的基础上,泰华自觉地了解和认知泰国的政治世界,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认知,进而进入泰国政治系统的政治录用过程,从消极的旁观者转变为泰国政治的积极的参与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泰国华人一直有着参政的传统,自古以来,华人为官者就多不胜数,华人完全融入泰国社会后,其参政人数也日益增多。泰国历届总理和内阁部长中有不少是华裔,中下层官员中的华人数更多。80年代中后期,华人在泰国政府官员中一度曾占了70%的比例。在高级军政官员中,华裔也占了80%以上。在议员中半数以上都是华裔。华裔参政之普遍由此可见^[22]。

四、结 论

依据派伊的“社会化三阶段”理论,本文在对泰国和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社会化过程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1、由于东南亚各国华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各不相同,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也不尽相同。泰国为华人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在其它有利因素的配合下,华人在社会化的三个阶段表现出前后连接、相互增强的势头。所以泰华融入当地的程度比东南亚其它国家快和彻底;和泰国相比,马来西亚华人所生存的社会从战前到战后表现出很强的过渡性,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表现出一种不断转变的态势,这使得华人社会化三个阶段呈现前后不一致的现象,从而自然延缓了华人落地生根的速度。2、虽然泰华和马华在政治社会化的条件和进程方面不尽相同,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三个群体”的界限在泰国已经不复存在,而在马来西亚已经变得很模糊了,正如庄国土教授所说:“……总体而言,东南亚华族的发展趋势是逐渐与当地主体族群融合,塑造共同的国家民族。”^[23]

[参考文献]

- [1] 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 [2] 游仲勋.资本主义各国劳动力的移动[M].熊本商大论集,1970-03(30),转引自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 [3] 彭加礼.19世纪开放西方殖民地的华工[M].世界历史,1980(4).
- [4] 郁树银.南洋年鉴[M].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出版,1951.
- [5] 东方杂志 1907(10),转引自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 [6][9] 古鸿廷.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马来亚篇[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 [7] Wang Gungwu, "Political Chinese: An Aspect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mode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Bernard Grossmann ed., *Southeast Asia in the Modern World*. P. 117.
- [8] 参阅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10][15]庄国土.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 1911-1941 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M].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 [11] 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M].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 [12] 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 1993.
- [13] Png Poh-Seng "The Guomintang in Malaya", in *Papers on Malayan History*, ed. By K.G.Tregonning, pp.214- 225.
- [14][16] 古鸿庭.东南亚华侨的认同问题: 马来亚篇[M].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
- [17]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 1959[M].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 [18] Chui Kwei-chiang. *The Response of the Malayan Chinese 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gapore: Nanyang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9] 星洲日报[N].1974- 07- 24.
- [20] G.W.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pp.323- 344.
- [21][22] 许梅.泰国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变: 动因分析[J].载东南亚研究, 2002(6).
- [23] 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J].世界民族, 2002(3).

《八桂侨刊》征稿启事

《八桂侨刊》创办于 1987 年,系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会刊,也是全国首家公开发行的省级侨史期刊,得到社会各界好评。经上级批准,自 2005 年下半年起,《八桂侨刊》恢复为季刊,坚持原办刊宗旨,融学术性、知识性为一体,内文增至 80 页码。热诚欢迎阁下赐稿。

《八桂侨刊》面向国内外组稿,具体要求如下:

一、凡有关华侨华人和现状历史(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历史、宗教、社团、习俗等)的论文、译著、资料、文摘、书评、信息、调查报告以及探讨各级侨办、侨联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等方面的稿件,均欢迎。

二、来稿力求文字简练,论文一般不超过 8000 字,论文包括题目、作者单位、单位所在地名及邮政编码、关键词、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本刊执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译文需附原文。若用 E-mail 投稿,另附纸质稿一份(个人资讯请另纸打印)。文责自负。除非事先说明,本刊有权对来稿作适当处理。

三、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电子信箱,以便于联系。署名悉听遵便。请勿一稿两投。三个月内无答复,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一经采用,即寄赠样刊两册并付稿酬。

四、为了扶持青年学子,本刊辟有“青年园地”专栏,欢迎高等院校的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青年业余爱好者投稿。

五、本刊亦征集反映海外华人社会(如:唐人街、中国城等)新貌的摄影作品。请用平光纸精放 8 英寸,不过塑,不装裱。请作者在照片背后或另纸注明内容简介。本刊不收经电脑合成的图片。